

白话商君书目录

第一卷

- 一、更法 (3)
- 二、垦令 (5)
- 三、农战 (9)
- 四、去强 (14)

第二卷

- 五、说民 (19)
- 六、算地 (23)
- 七、开塞 (28)

第三卷

- 八、壹言 (32)
- 九、错法 (34)
- 十、战法 (36)
- 十一、立本 (38)
- 十二、兵守 (39)
- 十三、靳令 (40)
- 十四、修权 (43)

第四卷

- 十五、徠民 (46)
- 十六、刑约(亡佚) (49)
- 十七、赏刑 (49)
- 十八、画策 (53)

第五卷

- 十九、境内 (58)
- 二十、弱民 (61)

二十一、御盜(亡佚).....	(64)
二十二、外内.....	(64)
二十三、君臣.....	(66)
二十四、禁使.....	(68)
二十五、慎法.....	(70)
二十六、定分.....	(72)
供 文	
六 法	(76)

第一卷

一、更 法

更法即改变法度。

秦孝公研究治国的策略，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候在孝公跟前。他们考虑社会情况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寻求役使民众的方法。

秦孝公说：“替代先君立为国君后不忘记国家政权，是当君主的道德准则；实行法治而努力彰明君主的权威，是做臣子的行为准则。现在我想改变法度来治理国家，变更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是又怕天下的人要议论我啊。”

公孙鞅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犹豫不决的行动不会有什么名堂，迟疑不决的行事不会有什么功效。’国君赶快拿定变法的主意，还是不要去顾忌天下人议论您啊。况且具有出众行为的圣人，本来就要被世俗社会所非议；具有独特见识的谋士，必然会被民众所嘲笑。俗话说：‘愚昧的人对于既成的事实都还不明白，聪明的人对于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情就已经观察到了。民众，不可以和他们谋划事业的开端，只可以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说：‘讲究最高道德的人不去和世俗附和，成就丰功伟绩的人不去和群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人民的，礼制是用来方便办事的。因此圣人治国，如果可以用来使国家强盛，就不去效法那旧的法度；如果可以用来使人民得到好处，就不去遵循那旧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圣人不去改变民众的礼

俗来施行教化，智者不去改变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着民众的礼俗来施行教化，不费辛劳而功业就能建成；根据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既熟悉而民众又安宁。现在如果要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的旧法，要改变旧的礼制来教化人民，我怕天下的人会议论国君，希望国君仔细考察一下这种情况。”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是社会上俗人的言论。平庸的人安守旧的习惯，学问们拘泥于他们的见闻。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维护法制，而不能和他们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但都能称王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度不同，也都能称霸诸侯。所以有智慧的人创制法度，而愚昧的人只能受法度的制约；有德才的人改变礼制，而没有德才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礼制束缚的人，不值得和他们商议政事；受法度制约的人，不值得和他们谈论变法。国君不要疑惑不定了。”

杜挚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工具。’我听说过：‘效法古代的法制，不会有过错，遵循古代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还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啊！”

公孙鞅说：“过去的朝代政教不同，该效法哪一代的古法？过去的帝王不相因袭，该遵循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施行教化而不加诛杀，黄帝、尧、舜施行诛杀而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社会情况而制定礼制。礼制、法度要根据时势来确定；制度、命令要各自顺应它们的相关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设备都要有利于它们的使用。我所以说：治理社会不必采取同一种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的称王，正是由于他们不遵循古法而兴盛的，商朝、夏朝的覆灭，正是因为商纣王、夏桀不变换礼制才灭亡的。这样看来，那么违反古代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可以否定，而遵循古代礼制的人也不值得赞扬肯定。国君不要再疑惑不定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偏僻里巷中的人们往往少见多怪，一知半解的学者常常发生争辩。愚昧的人所高兴的事，聪明的人为它悲哀；狂妄之徒所欢乐的事，贤能的人为它忧伤。甘龙、杜挚等拘泥于世俗偏见来议论，我不再因为他们的说法而疑惑不定了。”于是就发布了开垦荒地的命令。

二、垦 令

垦令即垦荒的法令。

不准官吏有隔夜的政务，那么即使是邪恶的官吏也来不及到民众那去谋取私利了。而群臣百官的公务不互相拖拉，那么农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邪恶的官吏来不及到民众那里去谋取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农民不受到损害而又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根据粮食产量来征收土地税，那么君主的地税制度就能统一，而农民的负担就公平了。君主的地税制度统一，就有了信用；有了信用，那么臣下就不敢搞歪门邪道。农民的负担公平，就会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易改行。君主有了信用而官吏不敢搞歪门邪道，农民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而不轻易地去改变它，那么民众就不会认为君主不对，而心中也不会怨恨官吏。民众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怨恨官吏，那么壮年人就会积极务农而不再改行。壮年人积极务农而不改行，那么年轻人就会学习他们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年轻人学习他们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要因为外国的势力而给人封爵位、授官职，那么民众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民众不看重学问，就会愚昧无知；愚昧

无知，就不会和外国交往；民众不和外国交往，那么国家就安全而没有危险。民众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务农而不偷懒。国家安全而没有危险，民众努力务农而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达官贵族的俸禄高而收税多，吃闲饭的人口众多，这是败坏农业的事。所以要按照他们吃闲饭的人口的数目征收赋税，并加重他们的徭役。这样达官贵族就不会多收食客因而那些邪恶不正、整日游荡、到处游说、好吃懒做的人就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这些人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就必然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使商人不得卖粮，使农民不得买粮。农民不得买粮，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勤奋耕作。商人不得卖粮，那么在丰收年景就不能靠卖粮食而更加享乐，在荒年也没有厚利可得，丰收年景不能更加享乐，荒年没有厚利可得。那么商人就害怕了，商人害怕经商，就想去务农。懒惰的农民勤奋耕作，商人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靡靡之音、奇装异服不准流行到各县去，那么农民出外劳动时就看不到奇装异服，在家休息时就听不到靡靡之音。在家休息时听不到靡靡之音，那么精神就不会涣散；出外劳动时看不到奇装异服，那么心意必然会专一。农民心意专一而精神不涣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准雇请佣工，那么大夫家长就不能建造修缮房屋，他们溺爱的子女和懒汉就不能再偷懒，而佣工也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混饭吃。这样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去务农。大夫家长不建造修缮房屋，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妨害。大夫溺爱的子女和懒汉不再偷懒，那么原有的田地就不会荒芜。农业生产不受到妨害，佣工更加努力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废除旅馆，那么奸邪诡诈、不安心本职、私下勾结、迷惑农民的人就不能外出旅行，而开设旅馆的人也就无法谋生了，那么他们就

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泊的资源，那么厌恶农耕、懈怠懒惰、加倍贪婪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了。这些人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提高酒、肉的价格 加重对酒、肉的税收 使税额是它成本的十倍 这样的话 那么卖酒、肉的商人就会减少 农民也就不可能再嗜酒畅饮，大臣也就不会再荒废政事而大吃大喝。商人减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农民不能嗜酒畅饮，那么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会懈怠。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务就不会拖延积压，国君就不会有错误的措施。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放松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加重刑罚，并使联保组织中的人连同罪人一起受到惩处 那么心胸狭隘、性情急躁的人就不敢再斗殴打架，凶暴蛮横、强悍刚烈的人就不敢再争吵辩嘴，懈怠懒惰的人就不敢再游手好闲，挥霍钱财的人就不会出现，用花言巧语来阿谀奉承而存心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耍花招了。这五种人不存在于国内，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使民众不得擅自搬迁，那么一些愚昧无知而蛊惑农民的人就无法施展其伎俩，没有什么地方再能混饭吃，而必定会去务农。愚昧无知、见异思迁的人都能一心一意地务农，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而愚昧无知，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同样地制订颁布有关嫡长子以外的儿子负担徭役的法令，按照名册使他们服役，并且提高他们免除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称量粮食的官吏那里取得口粮，但取得口粮时必须合乎一定的标准。由于不可能逃避徭役，而大官又不一定能当得上，所以这些贵族子弟就不可能周游四方去侍奉豪门权贵，而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和大夫们，对于博学多闻、能言善辩、施展智巧、外

出周游而寄居他乡的事情，都不准许做，尤其不准到各县去居住活动，那么农民就没有什么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见到儒家学说。农民没有什么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见到儒家学说，那么聪明的农民就没有门径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而愚蠢的农民也就更加愚昧无知，不会爱好学问。愚蠢的农民愚昧无知，不爱好学问，那就会致力于勤奋耕作。愚蠢的农民致力于勤奋耕作，聪明的农民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命令在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准有女子；又命令其中的商人，让他们每人都给自己所在的部队供应好铠甲兵器，使他们时刻注意军队的战斗动员情况；又使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准有私下运输粮食的人。这样的话，运用私通的谋划就无法搞到隐藏的场所，偷粮食的人就没有地方出售，运粮的人就不能私下贮藏，轻浮懒惰的人就不会到军队内部的集市上去活动。偷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售，运粮的人不能私下贮藏，轻浮懒惰的人不到军队内部的市场上去活动，那么农民就不会到处游荡，国家的粮食也就不会破费，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各县的政治措施必须一个样子，那么调职升迁的官吏就不能美化自己，接替的官吏就不敢改变国家所统一的制度，由于犯了错误而被罢免的官吏也就不能隐瞒他的错误行为。官吏的错误行为不能隐瞒，那么当官的就没有邪恶的人了。升迁的官吏不能美化自己，接替的官吏不敢改变制度，那么从属官员就可以减少，而农民就不会有过重的负担。官吏没有邪恶的行为，那么农民就不会四出奔走，逃避他们，农民不四出奔走，那么农业就不会遭到破坏。从属官员减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农民没有过重的负担，那么务农的时间就多了。务农的时间多了，征收的赋税不多，农业不遭到破坏，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的商品税，那么农民就不愿意经商，商人就会有怀疑松劲的思想。农民不愿意经商，商人顾虑重重而懒得经

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按照商人家中的人数来向商人摊派徭役，使他们家中劈柴的、赶车的、服役的、当僮仆的各种家丁 必须到官府登记注册 并按照名册服役 那么农民就安闲 而商人就劳苦。农民安逸 那么良田就不会荒芜 商人劳苦 那么往来赠送的礼物 就不会运到各县。这样的话，农民就不会挨饿，办事也不会再搞什么送礼之类的礼仪客套。农民不忍饥挨饿，办事又不搞什么礼仪客套，那么他们对于公家的工作就一定会积极去干，而私人的事情也不会荒废，这样，农业方面的事情就一定能够搞好。农业方面的事情一定能搞好 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规定运送粮食时不得采取雇用别人车子的办法，运送粮食的车子不准在返回途中受雇给人家，车子、拉车的牛、所载粮食的重量在实际服役时必须和注册时的登记相当。这样的话，送粮的车子就去得迅速来得也快，送粮的工作就不会妨害农业生产。送粮的工作不妨害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准为罪人向官吏请托说情，送饭给他们吃，那么邪恶的人就没有了主子。邪恶的人没有主子，那么为非作歹就得不到鼓励。为非作歹得不到鼓励，是因为邪恶的人没有了依靠。邪恶的人没有依靠，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农民不受到损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三、农 战

农战即农耕与作战。

大凡君主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国家赖以兴盛的，是农耕和作战。现在民众取得官职爵位，都不是靠了农耕和作战，

而是靠了巧妙的谈说和空洞的说教，这就只能叫做勉励民众，而不能称为兴国。只会勉励民众的君主，他的国家必然没有实力；没有实力的君主，他的国家必然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教育民众都专心从事农战来取得官职和爵位，所以不专心从事农战，就不能做官、没有爵位（此当作“是故不作壹，不官无爵”）。国家清除空谈，那么民众就朴实；民众朴实，就不会放荡。民众看到君主的爵禄奖赏只从从事农战这一个口子发放出来，那就会专心从事农战了；民众专心从事农战，那就不会苟且经营其他的行业了；民众不苟且经营其他的行业，那么国家就实力雄厚；实力雄厚，那么国家就强大。现在国境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 而官职和爵位照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才干出众的人都愿意改行 而致力于学习《诗》、《书》 追随外国的势力，这样弄得好的可以得到显赫的地位，差一点的也可以得到一官半职；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去经商，搞手工业，都靠这些行当来逃避农耕和作战。上述这两种情况都具备，国家就危险了。对于民人，君主用上述这两种人的行为作为教育的内容，他的国家就必然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粮仓虽然满满的，对农业也不放松；虽然国家大、人口多 对空谈也不放任 这样 民众就朴实而一心一意地行善了。民众朴实而一心一意地行善，是因为官职和爵位不能用巧诈的空谈来取得。官职、爵位不能用巧诈的空谈来取得，那么奸诈的人就不会产生。奸诈的人不产生，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迷惑了。现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据有官职、爵位的人，看见朝廷上可以用巧诈的空谈、动听的游说来取得官爵，所以官爵就不可能再按照国家的法规来取得。因此他们上朝就曲意逢迎君主，退朝回家就图谋私利、考虑饱其私囊的办法，这样的话，他们就在下面卖弄权势了。曲意逢迎君主而图谋私利，是不利于国家的，但他们要这样做，是为了那爵位俸禄 在下面卖弄权势 就不是忠臣 然而他们要这样做 是

为了追求钱财。这样的话，下级官吏中一些希望升官的人都说：“只要钱财多，高官厚禄就有指望了。”又说：“我不用钱财去贿赂上级而想求得升官，就好象是用猫作诱饵来引诱老鼠罢了，一定没有什么希望的；如果用真诚去侍奉上级来谋求升官，那就好象是拉出那断了的墨线而想去矫直（原文“乘”当作“绳”）弯曲的木料，更加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两种办法都不可以用来达到升官的目的，那我怎么能不向下役使民众，勒索钱财去贿赂上级，来求得升官呢？”老百姓说：“我积极耕作，首先装满了国家的粮仓，然后收拾剩余的粮食来供养父母；为君主舍生忘死地去作战，以便使君主尊贵，使国家安全。但结果国家的粮仓空虚，君主的地位卑微，自己的家庭贫穷。这样的话，还不如去找个官做。”亲戚朋友一合计，那就会改变从事农战的主意了。才干出众的人就会致力于学习《诗》、《书》，投靠外国的势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会去经商，搞手工业，靠这些行当来逃避农耕和作战。对于民众，君主用上述这些人的行为作为教育的内容，粮食哪能不减少，而兵力怎能不削弱呢？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任用官吏的法令制度严明，不用智慧和谋划。君主只致力于农战，民众就不会苟且经营其他的行业，这样，国家的力量就能集中了。国家的力量集中，就强盛；国家喜欢空谈，就削弱。所以说，从事农战的人有一千个，但如果有一个学习《诗》、《书》而善辩智巧的人在那里，那么这一千个人对农战就都会松劲。从事农战的人有一百个，但如果有一个搞手工业的人在那里，那么这一百个人对农战就都会松劲。国家依靠农战才能安定，君主依靠农战才能尊贵。至于那民众不去从事农战，是因为君主喜欢巧辩空谈而任用官吏丢了法规。按照法规来任用官吏，国家就治理得好；专心致力于农战，国家就富足。国家富足而又治理得好，这是称王天下的途径。所以说：称王天下的途径不在于外交，而在于本身致力于农战罢了。

现在君主只考察人们的才能智慧而任用他们，那么有智慧的

人就会观察君主的爱憎来使用官吏、裁断政事，以迎合君主的心意。因此任用官吏没有法规，国家就混乱而不能专心从事农战，善辩游说的人就会无法无天了。象这样，民众从事的职业怎能不多？而耕地怎能不荒芜？《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廉洁、善辩、聪明 国家有了这十种东西 那么君主就无法使民众守卫攻战了。国家用这十种东西来治理，敌人来了必然会丧失国土；敌人不来也必定会贫穷。国家清除了这十种东西，那么敌人就不敢来侵犯，即使来了也一定会败退；如果出兵征战，定能夺取别国的领土；如果按兵不动，国家定能富足。崇尚实力的国家用难以取得的东西去攻打别国，用难以取得的东西去攻打别国的国家必定兴盛；喜欢巧辩空谈的国家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的国家必定危险。所以有神通的伟人、英明的君主，并不是能够完全知道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只是知道了各种事物的要领。所以他们治理国家，不过是考察那要领罢了。

现在治国的人多半不得要领。在朝廷上议论治国的措施时，说客们都乱哄哄地致力于改变对方的主张。因此，那君主就被各种说法搞糊涂了，那官吏就被各种言论搞得晕头转向，那民众也被搞得懒懒散散而不干农活了。所以国内的民众，都变得爱好辩说空谈、乐意学习儒家学说，从事商业经营，干手工业，逃避农战。象这样，离亡国也就不远了。国家一旦出了事，因为学者憎恶法度，商人善于见风使舵，手艺人不能被利用，所以国家就容易被敌人攻破。因为务农的人少而靠游说来混饭吃的人多，所以国家就贫穷危险。如今那些螟虫、蝗虫、青虫等害虫 春天生出来 到秋天就死了 尽管它们寿命极短，但只要出现一次，民众就几年吃不上饭。现在一个人耕种，而一百个人吃他打下的粮食，这些寄生虫如果比作为螟虫、蝗虫、青虫之类 那也就够大的了。这样的话 即使有了《诗》、《书》 每乡一捆、每家一卷 对于治国还是毫无益处的。因为这并不是个反贫为富、反危为安的办法。所以过去的帝王靠农战来扭转贫

穷危险的局面。所以说：一百个人务农而一个人闲着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十个人务农而一个人闲着的国家；就强盛，一半人务农而一半人闲着的国家就危险。所以治国的人总是希望民众务农。国家如果不注重农业，那么在和诸侯争夺霸权时就不能自己保住自己，这是因为民众的力量不够啊。所以，如果别的诸侯国抓住它的虚弱来侵扰它，利用它的衰微来进攻它，它的领土就会被侵占剥夺，而国家也就一蹶不振了，到那个时候，再想办法也就来不及了。圣人知道治国的要领，所以使民众把自己的心思都集中到务农上。民众把心思都集中到务农上，那就朴实而可以被治理好，忠厚而容易役使，真诚（原文“纷纷”当作“纯纯”）而可以用来守城攻战。民众专心于农战，那就少有欺诈而看重故居不愿迁徙；民众专心于农战，那就可以用奖赏和刑罚来督促；民众专心于农战，那就可以在对外作战时加以使用。民众之所以能亲附君主而为了法令去牺牲，是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从事耕作。民众之所以不可以被利用，是因为他们看到巧言善辩的游说之士去侍奉君主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经商可以发家致富、做手艺也足够用来糊口了。民众看到这三种行当既方便又有利，那就一定会逃避务农了。要逃避务农，那么民众就会看轻自己的故居。看轻自己的故居，那就一定不会为君主守城作战了。凡是治国的人，都怕民众流离分散而不能集中，因此圣人实行重农重战这个政策，是为了把民众集中起来。国家专心于农战一年，就会强盛十年；专心于农战十年，就会强盛一百年；专心于农战一百年，就会强盛一千年；强盛一千年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君主制定赏罚制度来辅助民众专心于农战的教育，因此他的教育有常规，而政治有成绩。称王天下的君主掌握了统治民众的最根本的关键，所以不等施行赏赐而民众就亲附君主了，不等封爵授禄而民众就从事农战了，不等使用刑罚而民众就拼命献身了。当国家危急、君主担忧的时候，巧辩空谈的人即使成群结队，对国家的安危也毫无益处。国家危急、君主担忧的原因，是面临强敌

大国。君主如果不能去征服强敌、攻破大国，那就要搞好防守的设备，熟悉地形，集中民间的人力物力，来对付外来的战事，然后祸患才可以消除，而称王天下的目的才可以达到。因此英明的君主改革政治而专心致力于农战，清除没有实际效用的东西，遏止那些搞虚浮空洞而不切实际的学问，以及从事不正当的职业而到处游荡的人，使他们专心于农耕，然后国家才可以富足，民众的力量才可以集中。

现在社会上的君主都担心自己国家危急和兵力薄弱，却又要听信游说的人。游说的人成群结队，他们啰里啰嗦，花言巧语，但毫无实际用处。君主喜欢他们的辩说，竟然不去追究这些辩说的实际效用。所以游说的人就得意了，在大街小巷诡辩，一帮帮地成群结伙。人们看见他们用这种手段来取得王公大人的欢心，就都学他们的样。这些人聚集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搞得乱哄哄的，平民百姓喜欢这样，达官贵人也喜欢这样。所以国内务农的就少了，而靠游说来混饭吃的人就多了。靠游说来混饭吃的人多了，那么务农的人就懈怠了；务农的人懈怠了，那么土地就会荒芜。学习游说的人成风，那么民众就会抛弃农耕去从事辩说，高谈阔论、欺骗造谣。民众抛弃了农业、靠游说混饭吃、并靠空谈来互争高低，因此背离国君而不臣服的人就多得了。这是使国家贫穷、使兵力薄弱的教化啊。国家如果凭能言善辩来任用人，那么民众就不会喜欢务农了。只有英明的君主才知道喜欢空谈是不能够增强兵力、开辟疆土的，只有圣人治理国家才能够专心致志地搞农战，把民众集中到农业上来。

四、去 强

去强即除去强悍之民。

采用使民众强悍不羁的措施来清除强悍不羁之民，国家就强盛；采用使民众俯首贴耳的措施来清除强悍不羁之民，国家就强盛。国家实行慈善的政策，坏人坏事必然增多。国家富足又用减少民众财富使之转为国有的方法来治理，这叫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盛；国家贫穷又用消耗国库去增加民众财富的方法来治理，这叫做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就削弱。军队敢干敌人所不敢干的事，就强大；对于战争之事能干敌人认为可耻而不愿干的事，就有利。君主贵在谋略变化多端，国家贵在法度少作变化。国家物资少 是因为弱小 国家物资多 是因为强大。拥有上千辆兵车的小国只拥有上千辆兵车所用的物资，是因为它弱小。战事有部署 士兵可资利用 国家就强大 战事安排混乱 士兵懈怠偷懒 国家就削弱。

务农、经商、做官这三项 是国家的合法职业。这三种职业所产生的虱害有六种：第一叫做“年终请客”，第二叫做“大吃大喝”，第三叫做“贩卖华美衣物”，第四叫做“贩卖珍奇玩好”，第五叫做“意志消沉”，第六叫做“办事消极”。这六种事情有了依靠 国家必然削弱。务农、经商、做官这三种职业依附于农民、商人、官吏三种人 而六种虱害依附于国君一个人。用法律来治理的国家就强盛；用政教来治理的国家就削弱。依法办事的官吏把政事治理得好就提升官职。政治措施博大 国家就弱小 政治措施狭小 国家就强大。使民众强悍而不顾法禁，国家就越来越削弱；使民众懦弱而谨慎守法，国家就越来越强大。采用使民众强悍不羁的措施来整治强悍不

之民的，就会亡国；采用使民众懦弱守法的措施来整治强悍不羁之民的，就能称王天下。国家强盛而不去进行战争，危害国家的毒素就会归聚到国内 礼制、音乐之类以及虱害就会产生 这样 国家就一定会削弱；国家进行战争，危害国家的毒素就会归聚到敌国，国内就不会有礼制、音乐之类以及虱害 这样 国家就一定会强盛。提拔有功劳的人 任用有成绩的人 国家就会强盛 虱害产生了 国家就一定会削弱。农民少商人多，因而官吏穷了、商人穷了、农民穷了，从事这三种职业的人都穷了，国家就一定会削弱。

国家有礼制、有音乐、有《诗》、有《书》、有慈善、有修养、有对父母的孝顺、有对兄长的恭敬、有廉洁、有善辩。国家有了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没有办法驱使民众去作战，国家必然削弱以至灭亡；国家没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有办法驱使民众去作战，国家必然兴盛，直至称王天下。国家用掩盖别人罪恶的所谓良民来统治告发别人罪恶的所谓奸民，就一定会混乱，以至于削弱；国家用告发别人罪恶的所谓奸民来统治掩盖别人罪恶的所谓良民，就一定能治理好 以至于强盛。国家利用《诗》、《书》、礼制、音乐、孝行、悌道、慈善、修养来治理的，敌人一到必然会使国土削减，敌人不来必然会使国家贫穷。国家不用这八种东西来治理，敌人就不敢来，即使来了也必定会败退；如果出兵去攻打别国，一定能取得土地，取得了它的土地后一定能够保持它；如果按兵不动而不去攻打别国，就一定能够富足。国家注重实力，叫做用难以取得的东西去进攻别国；国家崇尚空谈，叫做用容易得到的东西去进攻别国。国家用难以取得的实力去进攻别国，动用一份力量就能获得十份的成果；国家用容易得到的空谈去进攻别国，使出十份力量就会丢掉百分的利益。

加重刑罚、不滥加赏赐，那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也就会为君主卖命 滥加赏赐、减轻刑罚 那是君主不爱护民众 民众也就不会为君主献身。兴盛的国家施行刑罚，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而且害怕君主；实行奖赏，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而且爱戴君主。国家没

有实力而玩弄智谋与巧诈的就一定会灭亡。对于胆小的人，利用刑罚来驱使他们作战，他们必然会勇敢起来；对于勇敢的人，利用奖赏来促使他们作战，他们就愿意牺牲。胆小的人变得勇敢，勇敢的人甘愿牺牲，因而国家没有敌手的，就强大，国家强大就必然能称王天下。对于穷人，利用刑罚来迫使他们耕织，他们就会富裕；对于富人，利用奖赏官爵来促使他们捐献钱粮，他们就会贫穷。治理国家能够使穷人富裕、富人贫穷，那么国家就会有雄厚的实力，实力雄厚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能够称王天下的国家，刑罚占十分之九而奖赏占十分之一；强盛的国家，刑罚占十分之七而奖赏占十分之三；削弱的国家，刑罚占十分之五而奖赏占十分之五。

国家专心从事农战一年，就能十年强盛；专心从事农战十年，就能百年强盛；专心从事农战百年，就能千年强盛。能保持千年强盛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国家有了威势，就能用一份实力取得十份的成果，靠声势取得实利，因而能够造成威势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能够造就实力而不能消耗实力的，叫做自我攻击的国家，它一定会削弱；能够造就实力而又能消耗实力的，叫做攻击敌人的国家，它一定会强盛。所以打击虱害、消耗实力、攻打敌人这三项措施，国家采用了其中的两项而放弃其中的一项，也一定会强盛；如果这三项都采用了，国家就会有威势，也就一定能称王天下。

在十个村的范围内才能决断是非的，国家就削弱；在五个村的范围内就能决断是非的，国家就强大。在白天能把当天的政事处理好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在夜里能把当天的政事处理好的国家，还算强盛；在隔了一夜以后才能把政事处理好的国家，就会削弱。

登记好民众的人数，活着的要著录在户口册上，死去的要从户口册上削除。这样，民众就不能逃避赋税，田野就没有荒地，那么国家就富足了，国家富足的就强盛。

用刑罚来去掉刑罚，国家就治理得好；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混乱。所以说：施行刑罚时对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那么刑